

RENÉ LEBES

勒内·莱斯

谢阁兰著

梅

斌译

郭宏安校

VICTOR SEGALIN



生活

联书店

47.13

52-0214

871680

VICTOR SEGALEN

谢阁兰著

梅

斌译

郭宏安校

勒内·莱斯

FRANCE LEXYS



10036125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图书馆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责任编辑：倪 乐

封面设计：海 洋

Victor Segalen

RENÉ LEYS

勒内·莱斯

LENEI LAISI

〔法〕维克多·谢阁兰 著

梅 斌·译

郭宏安 校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8.25印张 157,000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定价(精) 14.00元 (平) 4.40元

ISBN 7-108-00457-7/I·102

目 录

评《勒内·莱斯》(中译本代序).....郭宏安 1

勒内·莱斯..... 13

“法国的马可·波罗”(译后记).....梅 斌 253

郭宏安

评《勒内·莱斯》

——中译本代序

维克多·谢阁兰是活动在本世纪初、以中国题材著名的一位法国作家。他的职业是医生，喜欢考古和旅行，骨子里是一位精神世界的探索者。他潜心著述，不求闻达，虽非有意“藏诸名山”，其作品的大部确是在他身后才陆续问世的，现在仍有遗稿等待出版，而他引起人们的重视则更晚，大约在本世纪50年代的后期，距今不过三十年。谢阁兰身后得名，并非依仗于中国地位提高，亦非凭借着东方的遥远和神秘，而实因他对“异国情调”提出了迥异于同时代人的独特的观念。

自从人有了地域的观念，就产生了对异方异域的向往和探求，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就形成了“异国情调”。“异国情调”的魅力出自神秘，神秘产生惊奇，惊奇激起探索的欲望。然而，“异国情调”各有不同，其不同不在于异国，而在于观念。观念之不同，产生了对异国的不同态度。在法国文学史上，从来以异国情调著称的作家对其描绘对象所持的态度主要有三种：或者以遁世者的面目出现，讴歌远离文明的牧

歌生活，如18世纪的圣彼埃尔·德·贝纳丹；或者一付征服者倨傲狂妄的神态，纯以猎奇或猎艳为乐，如19世纪的彼埃尔·洛蒂；或是身在异国而一意求同，对异国特有的文明麻木不仁或竟不屑一顾，如保尔·克洛岱尔。只有16世纪的蒙田不为流俗所蔽，独树一帜，力倡“文明人”与“野蛮人”之间的“平等和睦”，申明野蛮人身上“毫无野蛮之处，只不过人人都称与自己的习俗不同的东西为野蛮罢了”。时隔三百年，他才找到了同调，这就是谢阁兰。谢阁兰从不满足于表面的猎奇，而力图真正地深入到另一种文明的内部；他从不坐井观天，蔑视或盲目崇拜一种陌生的文明，而是带着冷静的目光进行顽强的探索；他也不以己度人，试图同化或抹杀另一种文明，而是竭力发现并突出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总之，他涉足异国异域，并非为了逃避或征服，而是为了获得新的感受和认识，扩大人类知识的版图，同时也把对异国文明的认识当作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一条途径。谢阁兰认为，“异国情调”不仅存在于空间的变动里，而且存在于时间的推移中，因此，他不止于探索异国异域的现在，还要追溯其历史，在其古老文明的上游徜徉沉思。这样，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极为遥远的中国，就成了谢阁兰梦寐以求的地方。中国广阔的版图，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物，浩如烟海的典籍，在他面前形成一个庞大的未知世界。异域与故乡的对照，古代与现时的比较，外界与内心的辉映……这种已知与未知的撞击，迸射出奇异的火花，成了他毕生追求的诗与美。

1917年4月2日，谢阁兰在一则关于“异国情调”的笔

记中写道：“诗人们，洞观者们，无时不在进行此种战斗：或在他们自己的内心深处，或是——依我之见——面对认识的高墙：空间和时间，法则和因果。面对认识的极限。对人来说，其中最微小的突破都远比突破兴登堡防线更为重要。”所谓“战斗”，指的是现实和想象、肉体和精神、已知与未来之间的关系。谢阁兰的异国情调观的本质在于探索，尤其在于探索的精神，而这种探索是在现实和想象的接合部进行的。他曾经提供过一个生动而深刻的象征：“两兽相向，嘴对着嘴，争夺着一枚朝代不可辨认的钱币，左边是一条颤抖的龙，它并不是象衰落的中国那样盘成一团，而是颤动着额小的翼、鳞和爪：这是想象，它的风格是隐蔽的。右边是一只躯体硕长、灵活的虎，它弓着腰，显出强烈的肉欲：这是现实，总是很自信……现在，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和回到他们所熟悉的兽的身上，或是怪物，或是有性别的四足兽。人以及一切人的感情都不在其中。上帝呢？上帝被撇在一边已经很久了。剩下的只是两兽争夺的那个东西。”在谢阁兰看来，这场龙虎斗就象征着人类的命运，即人类始终是在肉体和精神、现实和想象的冲突搏斗中开辟认识的道路的。在他的面前，清宫的紫禁城无异于人的“认识的极限”。四围的高墙无异于人的目力所不能越过的一堵“认识的高墙”。《勒内·莱斯》就是他试图突破这堵“高墙”的一种努力。

谢阁兰生于1878年，自1909年至1917年，前后在北京、天津等地居住达七年之久。他无论是行医，还是考古，总是对古老的华夏文明表现出真诚的敬仰和探索的热忱。他为

了深入华夏文明的奥秘，曾经在广袤的黄土高原上奔走，在湍急的长江上游航行，在四川的腹地考察。他参加过扑灭鼠疫的斗争，发现过大量的汉朝墓葬和碑刻，测量过长江的源流和水位。他在探索华夏文明的道路上已经走在了同时代作家们的前面，然而，紫禁城的宫墙遮断了他的目光，金水桥下的护城河挡住了他的脚步，宫廷的内部成了秘密的秘密，“认识的极限”。这是一种象征，象征着可见可触的物质世界，也象征着他的内心世界，而这残阳夕照中的古老帝国也就成了他思考现实和想象之关系的广阔天地了。

法国批评家让-路易·贝杜安指出：“至少有四条道路通向诗人的‘宫廷深处’，即《勒内·莱斯》，《碑》，《画》，《远征》。”如果说，《碑》在古代中国的山川风物中幻出了诗人梦寐中的国度，《画》展示了诗人在一幅幅中国画面前所产生的神奇空灵的幻想，《远征》在一个“现实的国度”和一个“想象的国度”之间架起了桥梁，那么，《勒内·莱斯》就是通向“认识的极限”的一条小路。这是一条崎岖的小路，时而“山穷水尽”，时而“柳暗花明”，而叙述者（小说中的“我”）就是一个在小路上奋力攀登的人，当他的所见、所触不能及于紫禁城内部的时候，便有想象来帮助他跨越护城河。虽然他始终未曾把足迹印在紫禁城内的土地上，他却凭借着想象力把目光抛过了宫墙。现实和想象在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中交锋，但是，争夺的目标，那枚古钱币，又使它们统一了。

1910年，谢阁兰在北京认识了一个法国人，名叫莫里斯·卢瓦。此人年方十九，讲得一口流利的北京话，颇熟悉

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官场内幕。谢阁兰当时正想学习北方官话，便由卢瓦的在邮传部任职的父亲介绍，做了青年人的学生。很快，师生间便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友谊，先生也便陆续向学生透露出一些既诱人又离奇的事情。莫里斯·卢瓦自称是已故光绪皇帝的朋友，常在一起游玩，并曾救过他的命。他还是宫廷特务机构的头目，每两周随同一个戏班子进宫一次，为隆裕太皇演戏。他声称挫败过暗杀摄政王的阴谋，曾经为笼络袁世凯镇压南方的起义出谋献策。更为惊人的是，卢瓦透露出他成了隆裕太后的情人，并使她产下一女。上述的一切，谢阁兰都记在一本名为《莫里斯·卢瓦秘史》的日记中，这部日记始于1910年6月，止于1910年10月28日。字里行间，谢阁兰也曾流露出某种保留和怀疑；但他却也从未曾有过卢瓦说谎的真凭实据。他对于卢瓦的故事，是抱着探索者的好奇心，与其信其无，宁肯信其有的，因为这种信与疑之间的徬徨正好鼓起了他的想象翅膀；他身在现实的土地上，精神却飞进了“世界的后方”。

谢阁兰根据他的这一段亲历写成了《勒内·莱斯》这部小说。“亲历”一语，在这里包含着所见和所闻两方面的内容。他看见的是北京“象一面棋盘座落在黄色平原的北部，四周是几何形状的城垣，城中大道如织，笔直的街巷把它切成方块”，他看见了紫禁城的围墙和角楼、煤山、白塔、前门，他也看见过摄政王的仪仗……他听到的则是莫里斯·卢瓦讲述的离奇的经历。因此，所见，就见者而言，其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而所闻，就不那么简单了，就闻者来说，其真实

性犹如所见,就言者来说,其真实性则不得而知,闻者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而难以辨别真伪,即便有所怀疑,也往往查无实据。《勒内·莱斯》的全部情节就建立在叙述者的可靠的所见和不可靠的所闻之间的绕缠纠结之上。中国人很可能因其荒诞无稽而一笑置之,西方人却完全可能因其神秘离奇而心醉神迷。

小说保留了日记的形式,但是主人公易名为勒内·莱斯,而最大的变化在于:谢阁兰加强了叙述者(作品中的“我”)的地位,使之成为小说中的一个与勒内·莱斯相伯仲的人物,而他们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则成为小说情节的主线。小说名为《勒内·莱斯》,实际上有两个主人公:日记撰写者即现实世界的观察者,勒内·莱斯即想象世界的探索者。后者是前者的替身,替他神游紫禁城。分别观之,无论是勒内·莱斯,还是日记撰写者,都不是一个完整的形象,把他们合在一处,才见出一个完整的人,有行动,也有思想;有现实的物质的梦幻。他们一个是精神,一个是肉体,肉体提出要求,精神则给予满足或补偿。

日记撰写者在现实的土地上寻找进入紫禁城的大门。他经常策马绕宫墙而行,深入北京的大街小巷,甚至前门外的酒楼妓馆;他广泛地搜集有关大墙里面的消息,求助于一切能够进宫的人,包括中国医生,外国医生,教师、官员等;他学习北京话,“等待直接的机会”,甚至考虑到“归化”的问题。他已经对北京有了相当的了解,然而这一切终归只是围绕着神秘的核心打转,紫禁城的宫墙在他面前筑起了一

道比“兴登堡防线”还难以突破的障碍。然而他认识了勒内·莱斯。他们的交往，如果说还不曾打开缺口让他进入宫廷，却至少为他设立了一个瞭望孔，使他得以多少窥见墙内的动静。于是他看见了光绪皇帝的孤独，摄政王的软弱，袁世凯的狡诈，隆裕太后的寂寞，特务机构的严密……他的面前是一抹斜阳，他的心中涌起的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浩叹，他要追寻的是那正在升起的辉煌的白日——想象中的古老的中国。

但是日记撰写者果真突破了“认识的高墙”吗？这个问题谁也不能给予肯定的回答。他用以窥探大墙后面的眼睛不是自己的，而是勒内·莱斯的；而勒内·莱斯用以观察的眼睛是不是自己的，也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他自己说的。他说的是真话，还是谎话？答案已经被他的神秘的死带走了。实际上，日记撰写者在兴奋之余渐渐产生了怀疑。他曾经多次提及勒内·莱斯的昏厥，嘲笑过他的怕鬼的故事，暗示出他有通灵的倾向。当勒内·莱斯突然死去之后，他终于意识到，莱斯向他透露的事情都出自他的并非有意的启发和暗示：他谈到“特务机构”，八天之后，莱斯就说自己是那里的要人；他问：“一位满洲女子可以被一位欧洲人爱上吗？”十五天之后，莱斯就声称成了隆裕太后的情人；他说到“毒药”，两天之后，莱斯便中毒身亡。他认为勒内·莱斯的话出自幻觉，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而后者幻觉正是出自他探索紫禁城秘密的热情。因此，当他说到勒内·莱斯和皇太后生下的孩子时，写道：“这是我

们俩的孩子，也是我自己的孩子！”这真是一语中的：是他对皇宫的热情激发了勒内·莱斯的兴趣，是他的暗示促使后者迎合他，给了他精神上的满足。勒内·莱斯故意编造谎言？还是他真地产生了某种幻觉？这永远是个迷。我们只能说，探索的热情激起了想象力，想象力补偿了行动的不足。现实和想象的结合构成了《勒内·莱斯》的生命线。

至于“认识的高墙”，如果考虑到日记撰写者的探索精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那么可以说这墙上已经出现了一道缝隙；但是，从探索的结果是不确定的这一点来看，这堵墙仍然固若金汤。这并非因为他之所见所闻（就言者来说）是虚妄的，而是因为勒内·莱斯的死留下了一团迷雾，遮断了认识的道路，使他仍旧被关在紫禁城外，停留在深刻的怀疑之中，《勒内·莱斯》表现了人试图认识外界，超越自我的一种努力。人在通向未知世界的道路上攀登的时候， he 可以把未知世界的界限一步步缩小，从而感到肉体上的快乐和精神上的解放，然而，他终于在核心的前面停住了，紫禁城的高墙挡住了他的去路，他只能凭借想象力在一片空白之上构筑神奇的宫殿，其间浮动着的怀疑的云雾，那枚龙虎相争的钱币的朝代仍然是不可辨认的。这种不可知的悲哀笼罩着《勒内·莱斯》，然而，这悲哀产生的不是绝望，而是进行不懈的探索的热情，这正是《勒内·莱斯》的动人之处，也是谢阁兰的杰出之处。

然而，探索异国文明本身并不能成为终极的目的，只有当它和探索者的祖国文明及其个人的精神世界相联系的时候，

候,它才能结出最丰硕的果实,才能促进两种文明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共同发展。这是谢阁兰在深入华夏文明的实践中给予人们的启示。他正是要通过对这种文明的探索来更深入地潜入自己的内心世界,实现“由中华帝国向自我帝国的转移”。1911年1月6日,他从北京写信给德彪西说:“……实际上,我来这里寻求的既不是欧洲,也不是中国,而是梦幻中的中国。我抓住它,一口咬住。”当他1909年踏上中国的土地的时候,这个神秘的帝国远非“一切只是秩序、美、豪华、宁静和沉醉”(波德莱尔《遨游》),而是风雨飘摇,岌岌可危,外受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内有资产阶级革命的冲击,正处在沉沦崩溃的边缘。而他向往的中国是继承着古老传统的中国,是未曾受到欧风美雨吹打的中国,是浸润着老庄思想的中国。因此,他需要创造一个“梦幻中的中国”,要通过发掘、珍藏、满是金子和废物的石海,最偏僻的道路、最遥远的年代来“复活”中国,总之,他要寻求的是一个凝聚在古代文化典籍中的中国。同时,这个遥远神秘的中国正与他的内心世界相应,使他的追求有所寄托,痛苦得以宣泄,精神可以在现实与想象的搏斗中翱翔。

谢阁兰的一生正当两个世纪之交。他面临着世纪末逃避现实的倾向和世纪初追求新鲜感受的热潮所形成的尖锐冲突,自幼就深深地感到了传统教育对精神的束缚,心中萌动着一种奔向远方以求解脱的渴望。他在学医期间,对精神病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对其在文学艺术中的表现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深感疯狂和理智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线。阅读

大量的资料使他进一步深入文学的殿堂；他成了象征派诗人儒勒·于斯芒斯的信徒，深受兰波的影响，对波德莱尔的应和论尤为服膺。然而，谢阁兰与世纪初的象征派诗人有很大的不同，他绝不鄙薄物质世界，也不摒弃感官的体验。因此，他既深受象征主义的影响，重视想象力的作用，能够体验“打乱感觉”所获得的通感的快乐，又不赞成他们唾弃尘世的生活，躲进象牙之塔，走上一条遁世的道路；同时，他也不象世纪初的自然主义者那样崇拜物质世界的真实，而是主张在现实的基础上孕育和驰骋想象，来冲淡现实世界的平庸和丑恶。在《勒内·莱斯》中，日记撰写者珍视任何一个接近紫禁城的机会，他骑马散步，面对着金碧辉煌的宫殿沉思默想，他到前门外同清朝的贵胄子弟们寻欢作乐，甚至梦想着与他们的汉语教师的太太演出一段罗曼史；同时，他又以一种执着顽强的热情感染着勒内·莱斯，在一种其真实性难以确定的情景中得到精神的满足，补偿没有结果的行动。《勒内·莱斯》这部小说实际上是谢阁兰为摆脱平庸丑恶的现实、追求一个新鲜的世界的一种尝试。“到未知世界之底去发现新奇”！半个世纪前波德莱尔发出的喊叫，现在又在谢阁兰的《勒内·莱斯》中激起了回声。

总之，在《勒内·莱斯》中，谢阁兰所描述的并不是现实的中国，而是想象的中国，不过，他的想象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而他的现实又以他深入华夏文明的结果为依据。因此，《勒内·莱斯》这部小说呈现出的是一种迷离恍惚，非真非假的画面；其环境描写取自作者的眼见，完全是真实的；

其事件则取自作者的耳闻，多半是虚妄的。真实与虚妄形成了尖锐而强烈的冲突，冲突中显露出作者内心深处的斗争。在谢阁兰的旅行图上，探索中华帝国和探索内心王国的路线是一致的。北京的紫禁城和精神的紫禁城是合二而一的。他需要一种形式表达内心的冲突，正如他在1913年1月26日写给儒勒·德·高尔吉埃的信中所说：“我在中国所极力寻找的不是思想，也不是主题，而是形式，鲜为人知、变化多端、高高在上的形式。”这个形式他找到了，那就是确定的现实和不确定的想象之间的相互联系、补充、激发、渗透和融合。《勒内·莱斯》力图说明，这种形式是人类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所必需的，否则他就永远只能在紫禁城的墙外打转。虽然他得到的认识可能是模糊的，不可靠的，但他毕竟以其想象力触及了未知世界。已知和未知的界限模糊了，这同样是扩大了已知的领域。怀疑和悲观使许多人气馁，止步不前，而在谢阁兰身上，却激发出一种继续探索的动力。

1983年10月

勒内·莱斯

[北京,1911年2月28日]——更多的,我就知道了。既然和会司^①要如此,又事涉皇宫,这次召见事前未曾应允,日后亦永不再准……我也就不勉强了,于是退了下来,毕恭毕敬地倒退着走了下来……

这本手记我不再写下去了,我应该用上面这番话——可笑也罢,巧妙也罢,由人说去罢——来结束它。我本想把它写成一本书,现在书也写不成了。(书虽未成,却有个好题目:《一本未曾写成的书》!)^②

我原以为书成之后,将比任何业已公认的小说都“完美”,都畅销,比任何征引繁富的著作都谨严。它胜于小说,它所记述的每一件真实的事情,都得之于封闭在四堵墙垣之内的魔力……而墙垣之内,我却进不去了。

北京是一件神秘建筑的杰作,这是不可否认的。首先,

^① 相当现在的礼宾司。光绪二十七年(1901)六月,清廷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所辖和会司“专司各国使臣觐见、晤会”等。

^② 据作者之子伊冯·谢阁兰说,这两段文字费解,“手记”似指作者根据与莫里斯·卢瓦(即勒内·莱斯的原型)的谈话记录整理而成的日记。